

超越民族：殖民主义与青岛的抵抗 (1897—1914)

[德] 余凯思

在 15 和 16 世纪，为了降服土著居民，攫取可能隐藏在海外的资源和财富，殖民政权经常需要依靠对武力和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与早期阶段的欧洲征服相比，19 世纪的殖民主义要复杂和微妙的多了。为了不仅仅是征服，而且还要统治和管理土著居民，人们发明了十分高级复杂的国家机器。19 世纪的殖民统治较少依赖于物质力量，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法律、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来维持对被降服居民的控制。¹正在形成的殖民“治理术(governmentality)”²是“机构、程序、分析和反思”的复杂综合体，其目的在于维持殖民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对各种资源的榨取。因此，教育、医疗和科学被认为是一用后来在柏林担任德国殖民大臣的伯恩哈德·德恩堡(Bernhard Dernburg)的话来说——“殖民主义者必须学习的最重要辅助科学(Hilfswissenschaft)”³。

但是，正如近来的学术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的那样，殖民地是这样一些区域，在那里，统治方案和优越性观念不仅得到了强制推行，而且也受到了被殖民者的约束和辩驳。⁴事实上，各种各样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行动主义

1 关于科学的作用，除了别的还参见派恩逊的开创性著作，派恩逊，刘易斯：《教化使命：精密科学和1830 - 1940年法国的海外扩张》(Pyenson, Lewis, Civilizing Mission. Exact Sciences and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1830-1940)巴尔的摩1993年和《文化帝国主义和精密科学：1900~1930年德国的海外扩张》(Pyenson, Lewis,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Exact Sciences. German Expansion Overseas, 1900-1930) 纽约1985年；奥斯本，迈克尔·A：《法国殖民主义中的本性、异国情调和科学》(Osborne, Michael A., Nature, The Exotic and the Science of French Colonialism) 布鲁明顿1994年。德克斯，尼古拉斯·B：《殖民主义与文化》(Dirks, Nicholas B., Introductio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载德克斯，尼古拉斯·B主编《殖民主义与文化》(Dirks, Nicholas B. (ed.),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赛义德，爱德华：《文化与帝国主义》(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纽约1993年和托马斯，尼古拉斯：《殖民主义的文化：人类学、旅游和政府》(Thomas, Nichol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广义的文化受到了深入探讨。关于科技参见海德里克，丹尼尔·R：《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与欧洲的帝国主义》(Headrick, Daniel R.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纽约1981年。

2 福柯，米歇尔：《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纽约1976年：143、195页。

3 德恩堡，伯恩哈德：《德国殖民扩张的主要目标》(Dernburg, Bernhard, Zielpunkte des deutschen Kolonialwesens) 柏林1907年：11页。

4 库珀·弗雷德里克：《受到质疑的殖民主义：理论、知识、历史》(Cooper, Frederick,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伯克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3-32

(political activism) 不仅造成了接受或拒绝欧洲所宣称的殖民主义思想和结构的可能性, 而且也造成了改变这些基本观念自身含义的可能性。而在所有此类质询中, 翻译和传输的问题都会赫然耸现。正如吕迪亚·刘 (Lydia Liu) 所展示的那样, 对应词 (equivalents) 之间是无法翻译的; 译者更多地是在主、客两种语言之间流动的翻译中间地带创造出一些同义的比喻 (tropes)。⁵ 这个被新语创造者的想象所占有的假定同义的中间地带遂成为了改变意义、修正和谈判的真正场所。这些空隙也包含着构造新概念和新知识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里, 捍卫和拯救国家的方案得到了明确表达。它容许从全球范围借用观念和术语, 也容许把这些观念转用于地方。

本文将对 1897—1914 年德国殖民当局在青岛殖民社会与中国居民发生的关系作一探讨。为了在中国居民当中建立起牢固的权威和控制机构, 德国殖民当局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青岛配置了若干先进技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他们不得不与中国民众打交道或者说进行互动。另一方面, 逐渐发生的相互作用也使中国民众有可能对殖民社会的某些领域产生影响。不同的中国群体有不同的利益, 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与德国殖民者进行互动。生活在腹地的农村居民公开地反抗德国统治。反抗在 1898—1900 年间导致了与殖民当局的暴力冲突。居住在城市区域的人们则被置于严格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地方精英, 例如与中国山东地方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商人, 宁愿采用诸如抵制洋货和罢市等非暴力形式的抵抗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对青岛殖民体系发出的最强烈批评来自要求种族平等的知识分子, 但也有诸如孙中山那样的人, 他们钦慕青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措施, 并且打算将之推广到整个中国, 尽管也要求消除外来支配。在受到讨论的每一个案例中, 再访殖民主义的行为都与超越地方殖民主义框架的民族主义者的策略和修辞结合在一起。

殖民世界中权力和话语的矛盾状况

新近的研究已经强调突出了殖民表现和殖民形式的异质性和多样性。⁶ 19 世纪的殖民地造就了高度复杂的社会体系。与宗主国社会和本土社会都截然不同, 殖民地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会上多变化的世界。⁷ 殖民地中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进程, 其特征远不是单一和平静的。这是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社会群体之间持续的对抗和冲突造成的。在这个充满争论和争斗的世界里, 权力和统治需要在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之间进行协商。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 在每个社会中,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由通过社会的相互作用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结合成一体的。

页。

5 吕迪亚·刘主编:《交流的记号: 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问题》(Lydia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 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37 页。

6 乌尔夫, 帕特里克:《历史与帝国主义: 从马克思到后殖民主义理论一百年》(Wolfe, Patrick, *History and Imperialism: A Century of Theory, from Marx to Postcolonialism*) 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 102 : 2 期, 1997 年 4 月, 第 388-420 页; 托马斯, 尼古拉斯:《殖民主义的文化: 人类学、旅游和政府》(Thomas, Nichol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1-32 页。

7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早已从理论上对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交世界的社会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

根据韦伯，权力可被定义为“在社会关系内部表达自己反对抵抗行为的意志的机会。”⁸与权力相反，权威则意味着“强迫人们服从的机会”。它包含有主要依靠官僚政治的行政管理来操持的形式性安排。因此，权威是建立在机构化支配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或在本案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理解为在特定制度框架内持续进行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性互动进程的观点，就给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在殖民体系内，土著居民决不仅仅是消极的接受者或单纯的牺牲品。殖民统治者在很多方面都是要依靠土著居民的。例如，建筑业和新建立的工业需要上万名劳工。事实上，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从同化或合作到抵抗和反叛。他们的行为改变了殖民世界发展的道路。

然而，韦伯的功能主义方法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强迫是怎样造成顺从的？高压政治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加之于社会成员的？韦伯只看到外在的方法（法律、专制主义或被韦伯称作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的宗教），米歇尔·福柯则争论道，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是一种深入一切的、内在的现象。⁹在其著名的作品中，他分析了法国古典时期“权力的多形体技术的发展”。在他看来，现在的权力不能被简化为高压政治和惩罚，它还包括一系列足以说服和操纵从属者的文化、科学和社会的技术。这些文化技术手段集中体现在某一话语上。据支配地位的话语产生了叙事、符号和重现，并且因此操纵了社会中大多数的文化和科学产品。借此，话语就能够影响对事实的普遍认识和公众理解。对福柯来说，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规训社会”的出现。福柯的方法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补充了韦伯的理论。在解释权力的性质和影响方面，“不可见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同军事暴力、法律强制或警察监督一样重要。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术”是一种全新的发展，它日益取代早先的军事行动模式。通过调度科学、文化和知识而在殖民地强化统治和权力的种种发展情况可在德国占领中国胶州湾殖民地一事中清楚看到。它不仅给其他殖民国家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也使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受到极大触动。

内化在控制和支配结构之中的话语把权力带入了殖民地世界，它也赋予殖民意识形态这样的可信性，即权力的行使是通过这些手段实现的。但话语和知识又反过来成为阻碍西方人支配的因素。许多学者倾向于忽略福柯晚年所强调的治理术矛盾性和话语权力不稳定的双重结构：“话语，并不总是（once and for all）顺从权力或者起而反对权力，它比沉默只是稍多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复杂概念和不稳定进程的存在，借此，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和结果，又可以是一种妨碍，一块绊脚石，一种抵抗方式和一种反抗策略的起点。话语传达和制造权力；

8 韦伯，马克斯：《经济与社会》（Weber, Max,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图宾根1985年：28页。

9 福柯，米歇尔：《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纽约1976年；《必须捍卫社会》法国学院课程记录（1975—1976）（Foucault, Michel,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巴黎1997年；福柯，米歇尔：《性史》（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纽约1990年。在福柯1976年的著作中，权力理论已经得到了概括论述；福柯1990年书，尤其是1976年1月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演讲。

它加强权力，但也损害和暴露它，使它脆弱并使反对它成为可能。”¹⁰

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中，也存在着通过各种非西方的代理人而产生的对殖民知识和技术加以转化和占有的相反进程。这些人经常受到民族主义的鼓励，并且为了更有力地抵抗帝国主义和外来统治都试图引进和利用从世界各地得到的知识和技术。

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经营

1897年11月，两名德国传教士的被害使德国政府得到了长期等待的占领华北山东省胶州湾的借口。事后，中华帝国清政府被迫于1898年3月签订条约，使德意志帝国获得了租借胶州湾附近一小块土地长达99年之久的权利。通过这一条约，德国还获得了一系列所谓的让步或者说在山东省建铁路和开发煤矿的特权。山东省遂被德意志帝国视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尽管胶州(Kiaochow)一是为新殖民地的名称一形式上只是一块租借地，但德国仍然把它当作殖民地来看待。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决不仅仅局限于租借地本身。修建通达省府济南的铁路和开采铁路周围的煤矿仅仅是德国向山东省施加更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统治的开始。

占领之后，胶州被置于海军署的权限之下。¹¹实际上，胶州是唯一一块由军事部门经营的殖民地。蒂尔皮茨(Tirpitz)在出自1月份的一个通告中解释了他的意图，他写道：“如果海军是居于殖民运动首位的，那么殖民的成功及其结果也将惠及海军”。¹²占领胶州湾将使海军获得普遍支持，克服反对党的反对并帮助实现蒂尔皮茨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计划。蒂尔皮茨的考虑被证明是正确的。到了3月，一份德国报纸就评论到：“在胶州发生的事情和为商业与传教创造的新希望增强了为海军牺牲的意愿。”¹³一个月后，即在4月份，德意志帝国国会最终批准

10 福柯1980年书，后加的强调。

11 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柏林1997年：181-184页收录的文件42和43。按照其他殖民地的正常程序，胶州本应由首相府或后来的殖民署管辖。但是1898年1月中旬由于来自强有力的帝国海军署国务秘书阿尔弗里德·冯·蒂尔皮茨上将的个人干预，皇帝威廉二世将胶州置于海军署的权限范围内了。此事非同寻常，并且是没有先例的。因为这样一来，海军署就成为了一个具备行政能力的政府机关，而不是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代表海军的利益和提出财政要求。德国海军最高指挥官的职责是对海军进行日常监督。1889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重组了海军指挥部的指挥结构。他创立了三个平等的机构：海军内阁（由副官古斯塔·冯·森登—毕布兰领导），负责一切关于海军人员的事务；海军署（由海军署国务秘书阿尔弗里德·冯·蒂尔皮茨指挥），其职责是代表海军的政治利益；最高司令部（有一位职位最高的总司令）则指挥所有的海军部门。参见胡巴池，瓦尔特：《德国行政管理史稿，第22卷：联邦和帝国当局》(Hubatsch, Walther, Grundriß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geschichte, Bd. 22: Bundes- und Reichsbehörden) 马堡1983年：188页及以下数页。

12 参阅蒂尔皮茨的日记，1898年4月1号，现存于BA/MA, 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帝国海军/帝国海军署卷宗，海军综合处）/6699，1-11对开页。

13 中心通信，1898年3月2日，转引卡尼斯，孔拉德：《从俾斯麦到世界政治。1890-1902年德国的对外政策》(Canis, Konrad, Von Bismarck zur Weltpolitik. Deutsche Außenpolitik 1890 bis

了所谓的蒂尔皮茨计划；该计划规定要建立一支令人敬畏的德国海军。这就导致了在居领导地位的海洋大国大不列颠和德国之间开展的军备竞赛，而这一竞赛当然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重要长时段因素之一。

毫无疑问，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是胶州湾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蒂尔皮茨对胶州情有独钟，不辞辛劳地翻阅和评议来自中国的每一份备忘录。他头脑中有一些远大目标。早在1896年，当蒂尔皮茨作为德国东亚舰队司令在中国度过了1年光景后，他就竭力鼓吹德国应加强在中国的扩张。他在私人通信中说道：“在下个世纪，诸如泛美（Panamerica）、大不列颠、斯拉夫族或在日本领导之下的蒙古族的大国联合集结将摧毁或彻底消灭德国（……）如果德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超出欧洲大陆疆域的强国的话。而那样做的绝对必要的基础是（……）海军。”¹⁴像同时代的，尤其是军事部门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蒂尔皮茨也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将其看作种族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因为在这一思想中，现代国家都被看作是由一个种族构成的）。蒂尔皮茨坚信只有殖民扩张才能有效地保证一支灵活的、全球性的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德意志种族的长久生存。应当注意的是，位于蒂尔皮茨在中国进行殖民扩张蓝图之核心地位的既不是经济的考虑，也不是外交的考虑，而是军事的考虑。

由于胶州对于蒂尔皮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他试图从柏林出发，仔细地筹划殖民地。蒂尔皮茨时刻提防来自当地殖名者或国内政治势力对其政策的干扰。他严格地限制了胶州总督的权力。¹⁵总督是一名海军军官，必须每月提交一份有关殖民地发展情况的报告。由总督颁布的每一项法令都要由蒂尔皮茨副署。一旦总督没有执行蒂尔皮茨所希望的政策，他们就会被解职。1898年的总督罗森达尔（Rosendahl）案就属于这一情况，因为蒂尔皮茨觉得罗森达尔忽视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¹⁶总督特鲁珀（Truppel）于1910年被解职，因为他没有为蒂尔皮茨所赞同的德华大学提供支持。¹⁷此外，通过在1898年4月宣布胶州为皇家“保护领”（Kaiserliches Schutzgebiet），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机构如帝国议会和联邦议院就被禁止为胶州立法了。

1902) 柏林 1997年：273页。

14 引自戴斯特，威廉：《海军政策与海军宣传—1897-1914的帝国海军署新闻局》(Deist, Wilhelm, Flottenpolitik und Flottenpropaganda. Das Nachrichtenbureau des Reichsmarineamts 1897-1914) 斯图加特 1976年：111页。

15 侨居青岛的德国人与设在柏林和青岛的管理机构经常发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当地的殖民者和商人批评说：他们没有获得参与地方事务决策的权力。三名被选为市民代表者，1907年以来是四名，有权就当前的事务发表评论。但是他们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因为总督并不为他的决定负责。此后市民对这种状况的批评越来越强烈。参见黑佛曼，奥托：《胶州—行政管理及司法审判》(Hövermann, Otto, Kiautschou. Verwaltung und Gerichtsbarkeit) 图宾根1914年：29页。

16 参见蒂尔皮茨致威廉二世，1898年10月7号，现存于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联邦档案馆 /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eichsmarine/Marinekabinett（帝国海军 / 海军内阁卷宗）/1837, 126-128 对开页，翻印于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柏林 1997年：352-353页。

17 参见派恩逊 1986年书：258页。

海军所占的重要地位对德国在中国的殖民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胶州应被改造成为一个“模范殖民地”，一个能够显示特殊的、富有创造性和富有实际成果的殖民主义路线的殖民地。“模范殖民地”意味着把胶州建设成展现现代文化、科学和技术成就的橱窗：海军为建设新城市青岛和新城市的基础设施，例如铁路连接点和港口设施等，投入了巨大财力。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一概念暗示着建立一种可作典范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海军在胶州看到了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理想、展现其按照军事模式经营殖民社会的效率的机会。不同于不列颠在中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胶州被置于海军部的严格监督之下了，几乎没有给任何形式的自治留有余地。殖民地经济主要由关注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大型工业企业（煤炭业、钢铁业）的建设的国家权威机构经营。在许多场合，殖民当局试图说服德国钢铁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克虏伯（Friedrich Wilhelm Krupp）在青岛开办一家造船厂。然而，该公司对 1899、1900 和 1904 年的 3 次提议都表示了拒绝，因为它认为在青岛不存在建立营利性造船厂的商业基础。¹⁸尽管在青岛有家名为弗兰茨·奥斯特（Franz Oster）的小型公司愿意接管造船厂，当局还是决定把它当作一个国家企业来经营。他们担心小型私人公司没有能力为建设大规模设施投入必需的大量资本。在诸如电力等其他部门，情形也是一样。当局喜欢“大企业”如西门子之流。当西门子决定撤出青岛时，当局不顾当地商人乐意接管青岛电站的事实，成立了一家国有企业。¹⁹小型的私人商业公司及其商业经营是受欢迎的，但其经济活动往往受到若干限制。它们在开业前必须申请各式各样的特许。此外，还有一些由官僚机构制定的营业准则。根据殖民经济条例，大型工业、殖民当局和海军应当互相支持，并为实现国家和经济的“永久扩张”²⁰这一共同目标而进行密切合作。发展的结果应当是在青岛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基地，而这一基地将为德国未来在东亚壮大军事力量创造条件。

与建立模范的经济秩序的意图完全一致，蒂尔皮茨也想对胶州的殖民社会加以操纵，使之沿着系统模式的方向发展。在青岛殖民社会中，日常生活受到了严格监控。殖民管理部门采取了若干强制措施，以便建立泾渭分明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管理部门力图避免不同种族或不同社会群体（例如士兵与平民）的混杂；胶澳租界被分割成不同的、按种族和社会群体划分的居住区。²¹殖民地的核心城市

18 见施雷克尔，约翰·E：《帝国主义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剑桥，马萨诸塞1971年：226页及下一页；西勒曼，迪尔克·亚历山大：《1897~1914年胶澳租借地（中国，山东）在德国管理下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Seeleemann, Dirk Alexand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Kiaochou Leasehold (Shantung, China) under German Administration, 1897-1914*）多伦多1982年。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论文：271页。

19 见西勒曼，迪尔克·亚历山大：《1897~1914年胶澳租借地（中国，山东）在德国管理下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Seeleemann, Dirk Alexand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Kiaochou Leasehold (Shantung, China) under German Administration, 1897-1914*）多伦多1982年。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论文：295-297页。

20 见阿伦特，汉娜：《极权主义的起源》（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纽约1951年：260页。

21 参见华纳，陶斯腾：《青岛殖民城市的建设：土地条例、城市规划和发展》（Warner, Torsten, *Der Aufbau der Kolonialstadt Tsingtau: Landordnung, Stadtplanung und Entwicklung*）载欣茨，

青岛，是完全为欧洲人准备的，而中国劳工只能居住在新建的市郊。

法律体系也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作出了严格区别。²²当地的习惯法被继续应用于“本地人”，而德国的法律（包括其法庭和法律诉讼程序）则仅仅适用于欧洲人。这一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在建立在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种族差别基础之上的。根据规定，应当按照当地习惯法处理“本地人”法律事务，因此负责中国人事务的官员们必须熟悉当地的习惯法并试着将它们编纂成符合德国管理需要的法典。村社首领可用传统的方式处理小型诉讼案件。只有较大的、中国人自己无法解决的案件才被允许转交由德国人担任的区长裁决。至于刑事案件，殖民管理当局则授权区长应用大清律例作出判决。殖民管理当局也亲自制定了一些刑事处理法规，但其条款规定相当模糊。例如，它声称所有“构成侵犯”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但它既没有定义也没有列举何种行为属于侵犯行为。此类条款显然违反了所谓“*nulla poena sine lege*”（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实施惩罚）的基本法律原则。此外，它也没有列举何种形式的侵犯将导致何种形式的处罚。这就意味着即使是轻微的冒犯，从原则上讲也可以被处以重罚。涉及中国人的大部分案件多由未受过法律培训的汉学家所充当的区长来处理。胶州法院只审理欧洲人的和欧洲人—中国人混合的案件，兼顾不服区长判决的上诉。

就殖民审判来说，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应当被看作是法律意义上胶州“本地人”？1912年，高级法官克鲁森(Crusen)在汉堡殖民研究所(Colonial Institute in Hamburg)发表演讲时声称胶州的本地人是“从伦理—文化意义上来讲的中国人”。²³克鲁森继续说，之所以对所谓的“本地人”不采用德国现代法律，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必须避免将德国法律应用于缺乏应用基础的民族。”因此，鞭答作为惩罚中国人而非欧洲人的最常用惩罚形式是完全允许的。对于轻微的违法乱纪行为，如在街道上吐痰或小便，警察可以当场抽打10鞭的方式予以惩罚，而不需要任何审判。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管理人员经常使用极端残酷和充满暴力的手段进行惩罚的报道，这些法规似乎主要是为了发挥一种心理威慑作用。应当使中国居民意识到，即使轻微的违法乱纪行为从理论上讲也将获致严厉的惩罚。对于殖民当局来说，作出此类规定的目的并不在于实际执行，而是将其作为符号权力加以利用。中国民众被迫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他们必须依赖殖民管理者的良好意愿。法律上的不安全感即为驯化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基础。

汉斯—马丁 / 林德，克利斯托夫主编《青岛——德国在中国殖民史的一章，1897—1914年》（Hans-Martin Hinz/Christoph Lind (Hrsg.), Tsingtau. Ein Kapitel deutscher Kolonialgeschichte in China, 1897-1914）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1998年，第84—95页；89页。

22 1899年4月，为中国人和欧洲人颁布的不同民法和刑法法令开始生效。参见1899年4月15号关于中国人法律地位的法令，载谋乐1911年书：72—77页。关于法律体系的讨论参见西勒曼1982年书：76—96页，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体系的歧视性和纪律性规定。比较重要的相关法令载罗梅君 / 余凯思1997年书：178页及以下数页。由于此类区别，这一司法体系有别于德国在其他殖民地实行的司法审判制度，参见沃尔特，乌多，保罗·卡勒尔协助：《德国的殖民法——一个很少受到研究的法学领域，根据土著人的劳动法撰写》（Wolter, Udo, unter Mitarbeit von Paul Kaller, Deutsches Kolonialrecht - ein wenig erforschtes Rechtsgebiet, dargestellt anhand des Arbeitsrechts der Eingeborenen），载《近代法学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Neuere Rechtsgeschichte）第17：3 / 4期，1995年，第201—244页。

23 克鲁森 1913 年书：5 页。

按照类似的模式，胶州的民事管理被组织到两个分离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结构之中。²⁴管理市郊的区长们尽量避免在司法和管理方面作出改动（因而与传统社区的领导人，例如仍然握有权力的村长，进行合作），但在城市各处却颁布了一系列新的、针对中国人的管理措施。²⁵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那些为居住在城市区域中的中国人制定的法规。这一立法的第 2 部分涉及到“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维持”，其中的条款详细规定到，每一位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都必须到管理中国人事务的官员那里登记注册。第 7 款严禁举行任何没有得到管理当局批准的集会。第 6 款声称，所有用中文书写的告示都必须得到殖民管理当局的正式批准。第 5 款则规定，晚上 9 点以后每位在大街上行走的中国人都必须提一盏灯笼。然而，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规定出现在第 3 部分：“维持公众健康的总规定”，其中第 10 款规定禁止任何中国人在青岛欧洲人城区定居，据说是出于卫生考虑。

针对中国人的法律规定、建筑条例以及土地制度（殖民管理机关垄断了土地买卖事宜）²⁶这一系列措施一起构成了胶州社会的本质特征，即具有深远影响的德国人和中国人的隔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青岛市内及其周围古老的中国村庄被夷为平地。居民被迁移到新建的台东镇和台西镇。所有这一切经常被说成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很明显，中国人被看作是“不干净的”和“有传染病的”，正如同时代许多医学论文所描述的那样，这被看作是由中国人“混杂的”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德国医师辩论道，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瘟疫的传播。²⁷例如海军医生科洛奈克（Kronecker）就在 1913 年在一篇发表于《医学通讯》（*Medizinische Presse*）杂志的文章中写道：“人口密集的生活区充满污物和害虫，最糟的是令人恶心的放纵性欲，尤其是中国男人的放纵，这就使得将中国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居住区隔离开来一事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与鹅、鸭的兽奸行为、（…）、同性恋、对男女儿的性虐待、各种最可怕形式的强奸案件天天都有发生并且遍布全中国，几乎从未受到中国政府的法办。”他得出的结论是：“不仅欧洲，而且全世界都必须承担与中国无产者的入侵作斗争的

24 诺埃姆1936年书：107页及以下数页，也见施雷克尔，约翰·E：《帝国主义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剑桥，马萨诸塞1971年：70及下一页。他们是少数几位认识到胶州这一特征的学者。

25 参见1900年6月14日关于居住在市区的中国人的管理规定，载谋乐：《胶澳保护领手册》（Mohr, Friedrich Wilhelm, *Handbuch für das Schutzgebiet Kiautschou*）青岛1911年：22—29页。

26 关于土地制度，参见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柏林1997年：173—176页；马维利：《中国人事务专员单维廉的青岛土地条例》（Matzat, Wilhelm, *Die Tsingtauer Landordnung des Chinesenkommissars Wilhelm Schrameier*）波恩1985年和马维利：《单维廉与青岛的土地制度》（Matzat, Wilhelm, Wilhelm Schrameier und die Landordnung von Qingdao）载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中关系论文集》（Kuo, Heng-yü/Leutner, Mechthild (eds.), *Beiträge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慕尼黑1986年，第33–66页。

27 参见乌特曼 / 菲尔斯：《青岛——一个殖民卫生学的回顾》（Uthemann/Fürth, *Tsingtau. Ein kolonialhygienischer Rückblick*）载《船舶和热带卫生学档案副刊》（*Beiheft 4 der Beihefte zum 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hygiene* 15）第15：4期，1911年，第5–39页。

严肃义务。”²⁸

这只是众多公开的、在其他“学术”论文和报告中也有明确表达的殖民种族主义的例子之一。这种殖民种族主义同样反映在上列引文所暗示的对“黄祸”的恐惧上。威廉二世皇帝发表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只不过是广泛传播的最著名“黄祸论”罢了。1900年后,有大量通俗读物蜂拥而现,它们都表达了类似的既恐惧又充满种族优越论的情感。²⁹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此类文章或宣传小册子都强调对公众健康和种族纯洁的威胁,宣称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将把这一威胁带到德意志帝国。因此,医学和人种学创造了一种支配性话语,在这一话语中,有关中国民众的习惯、风俗和道德的描述成为了实施必要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依据,以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名义。同时,它也成了对殖民地中国民众实行严格的监视和控制以便教育和改善其习性的合法性证明。医学的和人种的话语因此是利用话语和侮辱为强大武器对本地人实施统治的有效手段。

在上文所描述的环境中出现的青岛殖民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德国在非洲占领的其他殖民地大不相同;胶州从未被设想为新的拓居地(settlement)。胶州主要是一个海军前哨。来自德国并想在胶州定居的所有人都必须事先向胶州总督提出申请。³⁰只有那些在贸易、工程以及建筑方面有特殊技能和经验的德国人才被允许入住青岛。殖民地内的德国人社会主要由肩负特殊使命的商人、技工和专家组成。³¹很少有德国家庭或妇女。男人们在诸如网球和马球等运动中寻找娱乐,也经常举行军事阅兵以及为庆贺皇室人员生辰而准备的欢宴。³²

中国民众大都属于旅居者。³³商人和劳工只是季节性地居住在青岛。更有甚者,

28 弗兰茨,科洛奈克:《胶州15年——一项殖民地医学研究》(Kronecker, Franz, 15 Jahre Kiautschou. Eine kolonialmedizinische Studie) 柏林1913年: 11页及下一页。

29 关于这些出版物的详细讨论参阅格尔维茨,海因茨:《黄祸——一个流行语的历史》(Gollwitzer, Heinz, Die Gelbe Gefahr. Ge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es) 哥廷根 1962年。

30 海军署国务秘书阿尔弗里德·冯·蒂尔皮茨在致海军内阁主管森登—毕布兰(Senden-Bibran)的信中强调每一位想在青岛定居者都必须先提交申请,见1898年6月2日蒂尔皮茨致森登—毕布兰的信,现存于BA/MA, RM 2/1836, 237对开页。

31 在1897—1914年的全部时间里,青岛的德国人口始终只有相当小规模。1913年的人口数不超过1855人,参见王正廷1922年书: 94页(作者使用了现今已见不到了的德文资料)。除此之外,全部德国军事人员则达到了2400人,参见谋乐:《胶澳保护领手册》(Mohr, Friedrich Wilhelm, Handbuch für das Schutzgebiet Kiautschou) 青岛1911年: 442页。

32 参见碧能艳:《1897—1914年德国在山东租借地青岛——因殖民化而引起的机构变化》(Biener, Annette S., 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Tsingtau in Schantung, 1897—1914.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durch Kolonialisierung) 波恩2001年: 318—330页。

33 这一点当然不符合居住在郊区的农民的情况。1914年胶州的中国人口数是187,000人。这其中,大约有55,000人住在市区。他们大多仅属于季节性临时居住在胶州的工人。见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柏林1997年: 238页及下一页。

即使在市区，妇女和家庭也很少。结果，卖淫在整个德国统治期间一直很猖獗。³⁴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个大型的中国人娱乐区就形成了。总之，殖民地社会系统具有人造世界的特征。这是由下列事实所决定的，即殖民地并非历史地成长起来的有机体，而是由外来侵略所创造的。在青岛殖民地社会中，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团体共存，但却又被社会的、法律和文化的屏障分裂开来。当然，在中国劳工和德国商人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在双方的官员之间，接触和互动时有发生，但所有这些互动看上去都是零星的和短命的。中国人和德国人实际居住在一个相互隔离的空间里。

在胶州殖民社会中，军事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仅仅因为海军掌控着殖民地。在青岛德国人口中，军事人员也占大多数。更重要的是，殖民当局在青岛所奉行的法律和社会政策都是以建立模范社会组织规划为前提的军事模式为导向的。建设的重点被放到改善公共卫生、促进民众健康、支持一种迅速建成并毫无摩擦的、有序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建立空间的和社会的官僚等级制体制上，具有明显的在19世纪德国和欧洲都得到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想的特征。米歇尔·福柯将这一思想描述为“军事的社会梦想”（military dreaming of society），它不是以社会契约或公民权利等观念为参照，而是一种强调纪律和服从的社会，并且从总体上把社会看作为一架机器。³⁵

抵抗和顺应之间：中国人针对德国殖民主义而采取的策略

在中国，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应对德国的侵略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并非单纯的、有意识的抵抗。每一种策略都无法摆脱地与改善全中国现状的社会政治目标交织在一起。由此，抵抗就成为了一种把当前的政治行动与未来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了。很明显，这是赢得政治支持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这些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的情况，其中包括官员、农村和城市居民、商人和店主、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孙逸仙等人。

外国殖民前哨在“圣人故里”山东省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清王朝文人和官员的高度关注。在得知德国于1897年11月占领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立即中断了在日本的旅行，辗转到达北京以便向皇帝呈递著名的第五次上书；该上书写于1898年1月。康开门见山地声称，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他在早先上书中就预言的被瓜分的严重威胁；在这些上书中他也反复要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按照康的说法，德国占领胶州对中国来说将产生一场危机，其中中国的整个存在都将受到威胁：“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辱我为聋瞽蠢

34 参见埃卡特，沃尔夫冈：《1897—1914年在中国的德国医生》（Eckart, Wolfgang, *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 Medizin als Kulturmission im Zweiten Deutschen Kaiserreich*）斯图加特1989年：31—33页。殖民当局尽力将殖民社会的这些方面掩盖起来，参见特鲁珀致蒂尔皮茨，1903年12月12日，载罗梅君/余凯思1997年书：220—222页。尽管有严格审查，卖淫一事还是会被德国报纸偶尔提到，参见例如1911年3月9日的《青岛最新消息报》，第9页。该报指出：“在大型娱乐区”许多小孩和年轻的女孩被迫卖淫。

35 见福柯，米歇尔：《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纽约1976年。

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之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³⁶康得出结论说，只有激进而长远的改革才能抵挡住入侵者，否则的话，中国必将遭到灭亡的厄运。上书中的警戒语调尤其给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兼任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留下了深刻印象。翁曾就租借胶州湾事宜与德国人进行过谈判并代表皇帝签署了条约。他在日记中写道：“把山东交给了卑鄙的外国人，实在愧对祖先。（……）这是我一生中受最大耻辱的一天。”³⁷后来，翁同龢在发起百日维新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人占领胶州也是导致在 1898 年推行虽然短命但却雄心勃勃的改革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康有为论证道，对于中国来说，抵抗帝国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彻底改造国家和社会，创建一个现代的中国。改革越彻底，中国就越能够对外国帝国主义作出有效的抵抗。

山东地方官员如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等人也十分紧张。³⁸他们同样认为形势是危险的，同样看到德国的占领造成了一种严重危机。但他们倾向于采取另一种应对德国入侵的策略，其前提就是“用民制夷”。这就导致他们容忍，甚至促进通过大众化社团扩展而形成的农村民众的自发行动。³⁹他们的目标不是改革，而是试图通过动员民众实现复辟。在北京中央政府得到广泛赞成的则是第三条道路。特别是李鸿章和翁同龢，既不倾向于改革也不赞成复辟。⁴⁰他们宁愿维持现状（status quo）。他们的工具便是外交。清帝国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感到不得不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因为中国明显地别无选择。此外，他们也急切地想维持社会稳定。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官员在如何应对外国帝国主义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就为民众的暴力反抗留出了容忍的权力真空。

在紧接占领后岁月所出现的紧张和恐惧中，在殖民政权与农村居民之间，在殖民地的腹地，多次发生暴力冲突。这个包括被认为有大量煤炭蕴藏的博山和潍县在内的腹地属于德国经济利益所关注的重点地区。为了开发煤炭资源，建立一条连接青岛和山东省会济南府之间的铁路；德国一些大型企业和银行于 1899 年成立了两个大财团。⁴¹这两家财团资助成立山东铁路公司（Shandong

36 汤志钧编辑《康有为政论集》（Tang Zhijun (e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Kang Youwei*）北京1981年：201-210页。

37 引自孔祥吉：《胶州危机与1898年的改革运动》（Kong Xiangji, *Die Jiaozhou-Krise und die Reform-Bewegung von 1898*）载《柏林中国杂志》（*Berliner China-Hefte*）12期，1997年5月，第42-56页。

38 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Esherick, Joseph W.,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伯克利1987年：198-200页，王守中1987年书：139-152页。

39 见例如 1897 年 11 月 19 日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的电报，载 DQSLXJ，第 257 页。

40 见张树枫：《李鸿章与胶州湾》（Zhang Shufeng, *Li Hongzhang yu Jiaozhouwan* [Li Hongzhang and the Jiaozhou-Bay]）载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Liu Shanzhang /Zhou Quan (Hrsg.), *Zhong De guanxi shi wencong*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青岛1991年，第66-80页。

41 关于德国公司和商家的具体情况见余凯思：《腹地的德国前哨—山东的基本建设》（Mühlhahn, Klaus, *Deutsche Vorposten im Hinterland. Die infrastrukturelle Durchdringung der Provinz Shandong*）载欣茨，汉斯-马丁 / 林德，克利斯托夫主编《青岛—德国在中国殖民史的一章，1897~1914

Eisenbahn-Gesellschaft) 和山东矿务公司 (Shandong Bergbau-Gesellschaft)。建造铁路和开采矿物，不仅仅是由中德条约带来的最具盈利性的经济机会，而且这两项工程的迅速完成也被看作是青岛港商业贸易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殖民当局和公司都希望铁路和矿务能尽快运营。任何耽误都将给公司造成损失并危及青岛的经济前途。

然而，德国公司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麻烦。农民不愿将土地卖给代表公司利益土地征购经纪人。他们要求更高的价格，或因在铁路公司想购买的土地内有他们的祖坟而拒绝出卖。公司不顾所面临的抗议，执意强迫推进建设工程，尽管有些地段的征购工作尚未完结。山东铁路公司的不妥协态度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普遍愤怒。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轻微的挑衅事件，例如一件发生在大吕小乡村的农民和铁路工人之间的争执，都会导致暴力冲突的公开发生。愤怒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决定阻止工人继续他们的工作。⁴²在有关民众骚乱的消息传到青岛后，胶澳总督叶世克 (Jaeschke) 马上决定“教训一下农民”。他认为德国军队随后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阻止进一步的抵抗行动的发生。叶世克命令大约 100 名士兵侵入大吕乡和它附近的堤东乡，对抵抗者采取严厉镇压。德军洗劫了 3 个村庄，并杀死了 25 人。⁴³

之后不久，德国军队又占领了高密县城达两周时间。⁴⁴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引起全中国官员注意的事情。高密既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城市，又以拥有众多科举考试成功者和功名获得者而闻名遐迩。⁴⁵在许多房舍上都有显示获得科举功名或出任达官贵吏的荣誉性标志。德国军队驻扎进了高密书院，书院内有一座著名的老图书馆。⁴⁶但是德国士兵在离开时摧毁了书院并放火焚烧了图书馆里的藏书。对儒家经典施加火刑 (autodafé) 象征性地表达了在青岛德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相信冲突的发生并非仅仅由于铁路的建造；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不仅要反对暴动的农民，而且还要从总体上反对儒家文明的战争。按照他们的信念，开化进步的西方文明必须克服落后的儒家文明，如果有

年》(Hans-Martin Hinz/Christoph Lind (Hrsg.), Tsingtau. Ein Kapitel deutscher Kolonialgeschichte in China, 1897-1914) 柏林: 德国历史博物馆 1998年, 第146-158页。

42 葛之覃致毓贤, 1899年6月29日, 现存于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Peking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5012/0-2, 292号。

43 见罗梅君主编, 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柏林1997年: 248页。

44 见杨来青:《高密事件与中国民众对德国铁路的抵抗》(Yang Laiqing, Die Ereignisse von Gaomi und der Widerstand der Bevölkerung gegen den deutschen Eisenbahnbau) 载罗梅君/余凯思主编《在中国的殖民战争——义和团运动的失败》(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Hrsg.), Kolonialkrieg in China. Die Niederschlagung der Boxerbewegung) 柏林2007年, 第49-59页。

45 山东的功名获得者有60%的人来自高密或胶州, 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Esherick, Joseph W.,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伯克利1987年: 30页; 王正廷:《青岛》(Wang Zhengyan, Qingdao) 青岛1922年: 1页。

46 葛之覃致毓贤, 1899年7月3日, 现存于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Peking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5010/0-2, 292号。

必要可不惜动用武力。1900年，叶世克在写给柏林的信中称：“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其一是建立在旧时代的传统基础之上的中国民族性的世界观，其二是主张世界政策的西方人的世界观。”⁴⁷

德国殖民者虽然在1899年6月采取过军事行动，但中国人的抵抗并没有减弱。铁路勘测员树立的标竿一次又一次地被拔掉。不过，直到1900年春，大规模的暴动并没有发生。在高密北部的壕里低地地区，人们担心铁路将毁坏排水系统并导致洪水泛滥，但在铁路公司看来，这只不过是企图阻止铁路建造的借口。⁴⁸公司极力催促总督再次采取军事措施以保护铁路建设工程。与此同时，壕里的人们也开始邀请义和团首领向他们传授武术和法术。义和团同样从不同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相信外国人的出现，尤其是铁路的建造，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引起了祖先和神灵的惶惑不安。他们更把1900年在山东发生的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真正原因归咎于宇宙和谐的遭破坏。⁴⁹面对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的迅速传播、袭击外国人事件的增多和清政府的宣战⁵⁰，殖民当局决定暂时撤退。叶世克命令所有德国人都要回到青岛。铁路建设工作被中止了。壕里的农民庆祝他们的胜利。

在1900年干热的夏天，随着国际救援力量的到达，形势发生了变化。9月末，在陆军元帅冯·瓦德西(von Waldersee)的指挥下，一支庞大的德国援军在天津登陆。10月6—7日，瓦德西与胶州总督叶世克在天津会晤，讨论了德国在中国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他们都赞同尽快将发生于胶州腹地的抵抗运动镇压下去，

47 胶澳总督叶世克的备忘录，1900年10月9日，现存于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联邦档案馆/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帝国海军/帝国海军署卷宗，海军综合处）/6782，276—308对开页。

48 中国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1902年，整个地区遭受了水灾；这一年的收成被毁掉，整个村庄也被大水冲走。德国总督派壕里低地地区的一名专家去调查原因。在一秘密报告中，工程师博恩(Born)总结到：洪水泛滥无疑是由铁路铺设造成的。他指责铁路公司修建的桥少且窄。原因是公司想要降低成本。参见工程师博恩致总督特鲁珀，1902年9月4日，载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柏林1997年：300—302页，文献83。此后特鲁珀敦促公司在壕里低地地区铁路线修建更多的桥。公司照做了，事后再没有发生水灾。

49 关于义和团的信仰体系见柯文：《历史三解：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拳》(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纽约1997年：84页及下一页。也见孙立新：《义和团运动的宗教和社会起源》(Sun Lixin, Die religioesen und sozialen Urspruenge der Boxerbewegung) 载罗梅君/余凯思主编《在中国的殖民战争——义和团运动的失败》(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Hrsg.), Kolonialkrieg in China. Die Niederschlagung der Boxerbewegung) 柏林2007年，第69—80页；达素彬：《义和团：动议、支持和动员》(Dabringhaus, Sabine, Die Boxer: Motivation, Unterstuetzung und Mobilisierung) 载罗梅君/余凯思主编《在中国的殖民战争——义和团运动的失败》(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Hrsg.), Kolonialkrieg in China. Die Niederschlagung der Boxerbewegung) 柏林2007年，第60—68。

50 见柯文：《历史三解：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拳》(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纽约1997年：14—56页。

避免铁路建造工程继续拖延。德国军队应当针对中国民众实施所谓的“惩罚性行动”。10月15日，200名德国士兵开进高密。10月23—11月1日，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3个村庄突然遭到炮火轰击并被完全摧毁。450多人惨遭杀害，其中有很多是妇女和儿童。⁵¹摧毁整个村庄的“惩罚性行动”沉重打击了中国民众的抵抗，并且有效地阻止了新的抵抗运动的再起。

发生于1899—1900年间的一系列暴力冲突大大加剧了德国殖民当局与中国农村居民间的紧张关系。暴力的升级也使青岛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恶化了。双方都感到他们不仅是陷入了经济或政治的冲突，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陷入了文明的冲突。这大大方便了对暴力和野蛮手段的使用。广大民众自发的反殖民主义抵抗斗争因此变得难以为山东地方精英驾驭了。

义和团起义期间，发生于中国民众和外来势力之间暴力冲突对山东产生了严重影响。外国的入侵方便了义和团的武术和法术涌入山东乡村。异端学说和实践的传播严重威胁着乡村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在德国殖民者活动频繁的地区。因此，1900年以后，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开始有系统地采取降温策略了。1900年，袁世凯和他后来的最主要继任者周馥和杨士骧在山东巡抚衙门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新政”在山东暗示着一种通过恢复传统秩序、重申帝国等级制度的方式，减轻帝国主义和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抵抗运动这两者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的策略。“新政”的外交维度包括为处理与德国人的关系而加强沟通的努力。除了解决因建造铁路或开采矿山所引起的纠纷外，山东巡抚们还十分关心如何抚恤胶州租界以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居民问题。自1902年起，山东巡抚定期走访胶州租界。较低级别的民政和军事官员甚至更频繁地到青岛进行正式访问。周馥是第一位参观过德国殖民地胶州的山东巡抚，他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讲述了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和德国当局所投入的巨额资金。⁵²同他一样，许多其他官员也表达了对德国计划的宏大规模的钦佩。他们在访问青岛时，都想仔细考察一下德国的体制。另一同等重要的目标是关照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在上文提到的1902年报告中，周馥也报告说，他已经派人到青岛中国居民中重建保甲制度了。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中国民众免遭殖民当局的侵犯。有效的保甲制度还能够切实避免自发性暴力反抗的发生。

当德国殖民当局注意到这些旨在建立代表中国人利益或扩大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的控制力的非正式机构的努力时，总督奥斯卡·冯·特鲁珀马上警觉了起来。他利用周馥到访的机会向他提出质问。特鲁珀还讲了德国人的立场；按照他的观点，青岛的中国居民应当只服从德国殖民当局的管辖。周馥力加反驳，他认为“青岛的中国居民仍属于他们的家庭和宗族，他们因此也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应当并且也必须从那里寻求帮助”。⁵³他进一步要求在青岛建立一个由中国

51 关于细节和文件见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柏林1997年：250页及以下数页。

52 周馥上奏朝廷的备忘录，1902年12月31日，现存于Academia Sinica/Jindaishi yanjiusuo（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02-11-13 (1)。

53 特鲁珀致蒂尔皮茨，1902年12月30日，现存于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联邦档案馆 /

人组成的官方机构，它将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并能经常地与德国人进行交涉。在由官方举行的晚宴上，周馥发表演说：“青岛的土地虽然被租借给了德国，但它仍是山东省的一个地盘。”⁵⁴对于特鲁珀来说，周馥的建议难以接受。特鲁珀认为这将严重削弱德国在青岛的统治权。

“新政”的内政维度包括1906年在济南、周村和潍县建立“自动开放的商业区”（自开商埠）措施。⁵⁵晚清时期，各省都迫切要求开放自己的一些城市开展国际贸易，以便促进中国内地省份的商业繁荣。⁵⁶应当允许外国人在所谓的商业区（商埠）置地营业。不过，与有着外国人定居地（租界）的条约口岸相比，这些商业区是受到中国的管辖和管理的。⁵⁷袁世凯和他的继任者还试图将商业贸易引进到山东农村地区。他们为此修建了道路，疏通了运河，以便把这些地区与跨地区的基础设施联系起来。此外，山东省政府也成立了一家在小清河上运营的轮船公司。⁵⁸经济关系的“树枝状的市场系统”⁵⁹被建立起来了。在这里，农村地区与拥有工场制造设施的开放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集散中心就在市场结构多种多样的层面上彼此互动起来了。“新政”标志着与不干涉经济的传统政治的明显决裂。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官员将系统的经济发展看作是聚集国力的基础。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 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 (帝国海军 / 帝国海军署卷宗, 海军综合处) /6718, 71-74 对开页。

54 特鲁珀致海军署, 1902年12月12日, 现存于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联邦档案馆 /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 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 (帝国海军 / 帝国海军署卷宗, 海军综合处) /6718, Bl. 13-15, 翻印于罗梅君主编, 余凯思协助: 《“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 / Mü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 柏林1997年: 334页。

55 施雷克尔, 约翰·E: 《帝国主义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德国在山东》(Schrecker, John.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剑桥, 马萨诸塞1971年: 155-157页; 巴克·戴维: 《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Buck, David,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威斯康星1978年: 51-54页; 张玉法1987年书: 596-598页。

56 由外国人占主导地位的通商口岸已经得到了很好研究, 但中国的这一反模式 (counter-model) 和经济创新基本上仍被西方和中国的历史编纂所忽略。1994年, 张践就此发表了一个总体看法, 见张践: 《晚清自开商埠述论》(Zhang Jian, Wan Qing zikai shangbu shulun [On the self-opened commercial zones in the late Qing-period]) 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第73-88页。

57 见“济南商埠的出租和建筑管理规定”, 现存于Academia Sinica/Jindaishi yanjiusu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03-17-1。

58 参见张玉法: 《青岛的势力圈: 1898~1937》(Zhang Yufa, Qingdao de shili jua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Qingdao])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 d.), Jindai Zhongguo quyushi yantaohui lunwenji [Essays of the Conference on Regional Modernisation in Modern China]) 台北1986年, 第801-838。

59 见布恩, 广·曼: 《天津的盐商: 中华帝国晚期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平民社会》(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檀香山: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 189页及以下数页。

这就意味着在指导社会 and 经济发展方面，赋予国家以关键性作用了。⁶⁰国家制定了发展型的政治目标和标准；据此，经济资源应当被加以重新分配。人们期望这种由政府资助的内地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地阻止德国在山东的垄断。⁶¹从政治话语层面来看，这一经济抵抗与对重商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观念的提升交织在一起；这些观念赞成拥有监督和管理经济和社会能力的强大国家的建立。⁶²

尽管受到德国的反对，中国官员依然继续关注青岛的中国居民。青岛的商人与济南的官员关系极好。许多商人获得了官方授予的头衔。但是，尽管彼此协助，商人们还是有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的，而这些目标和利益与官员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相同。像在所有商业城市的情形一样，青岛的中国商人也成立了一些会馆，并通过它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1900年有3家会馆成立：代表来自天津和山东的商人利益的“齐燕会馆”、代表长江下游商人利益的“三江会馆”以及代表广州商人利益的“广东会馆”。1913年又新增了两家会馆：昌邑会馆和海阳会馆。在这两家会馆中，都有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参加。⁶³因此，传统模式为青岛中国商人的自治组织奠定了基石。同时，商人们也试图建立新型结构。经过长时间讨论，总督特鲁珀终于在1902年批准了中国商人和店主期望建立一个委员会的请求。这个所谓的中国人委员会（Chinese Committee）应就某些特别的经济问题进行审议。委员会成员是通过各会馆内部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的。总督希望中国商人与德国管理机构进行合作，以便巩固德国的统治。但委员会逐渐强大了起来。它在1908年明显地支持一场由中国商人和中国工人发起且组织良好的联合

60 关于这一点见韦克曼，弗里德里希：《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1989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Wakeman, Frederic, Jr.,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载利波塔尔，肯尼思等主编《现代中国透视—四周年纪念》(Lieberthal, Kenneth u. a. (Hrsg.),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纽约1991年，第68-102页。

61 德国官员们对这一点很清楚。特鲁珀在致海军署的信中写到：“开通商业区的（...）目的是削弱德国人的优势地位”，此信现存于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联邦档案馆 /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帝国海军 / 帝国海军署卷宗，海军综合处）/6729, Bl. 1-2。

62 关于建立强大国家的宣传见逊恩，迈克尔：《中国的民族、统治和现代性：1900-1927年的广州》(Tsin, Michael,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9年；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质疑近代中国的叙述》(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芝加哥1995年：159页；亨特，迈克尔·H：《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强大的国家：晚清共和的危机》(Hunt, Michael H.,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Late Qing-Republican Crises*) 载迪特默尔，洛厄尔 / 吉姆，塞缪尔·S主编《中国的民族认同性探索》(Dittmer, Lowell/Kim, Samuel S. (e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伊萨卡1993年，第62-79页。

63 关于行会的讨论见张玉法：《青岛的势力圈：1898-1937》(Zhang Yufa, *Qingdao de shili jua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Qingdao])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 d.), *Jindai Zhongguo quyushi yantaohui lunwenji* [Essays of the Conference on Regional Modernisation in Modern China]) 台北1986年，第801-838：835-836页。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超殖民地”天津，见布恩，广·曼：《天津的盐商：中华帝国晚期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平民社会》(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

抵制洋货运动；这类集体性的和高度政治性的反对殖民政权的行动使德国殖民当局深感震惊。其导火线是租用刚刚建成的港口库房的价格大幅度提升。新收费标准明显偏向于德国的大型贸易公司。中国人委员会向中国民众发出动员令，要求停止购买德国产品或光临德国商店。商人则拒绝与德国公司进行贸易。只是在管理机构作出了实质性让步后，针对德国的联合抵制才宣布停止。在概述 1908 年的联合抵制运动时，德国总督用非常失望的笔触写道：“中国人仍然是用中国人的方式感受和思考的。”⁶⁴因为这些事件，中国人委员会在 1910 年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由总督挑选的顾问。

青岛商人在山东“收回路矿权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 1900 年以来，地方商人反对中德条约中部分条款的抗议斗争愈演愈烈。根据这些条款，清政府把修建两条铁路线（青岛—济南线和青岛—沂州线）和开采铁路沿线煤矿的独占权和特许让给了德国的辛迪加。⁶⁵1908 年，与青岛爆发联合抵制洋货运动同时，一个主张收回路矿利的同盟会在山东成立了。他们一方面对于收回山东铁路的建造权和矿山资源开采权表达了最急切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有长期的斗争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向全中国人民揭露殖民政权所作的坏事和它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他们在报纸和杂志当中看到了一个形成和影响公众意见的有效武器。与此同时，他们也抨击清政府过于软弱的胶澳政策。在协会成立宣言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夫世界生齿日繁，各国皆有人满之患，徒恃（事）耕凿（作）以营生，即下愚亦知其非计。故最大利源，惟路与矿。未有此两大权尽握于人，而工人犹能生存者。”⁶⁶在宣言的末尾，他们建议采取两种恢复失去的权力的策略。第一，通过印刷和散发报纸使人们认识到政治事件和经济观点的重要性：“机关维何？曰：‘不知者而使之知，其知则促其行。’”第二，评论员总结说，如果人们不热爱他们的家乡，报纸就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这一话语中，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只提到了山东人，既没有谈论全中国，也没有讲中央政府。收回利权运动并未促进中央国家的观念，与之相反，却强调了地方自治的必要性。⁶⁷同时，他们还要求言论自由。在这里，有关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目标也占据了突出地位。根据这一策略，地方性公共领域的出现不应当受到国家权威的任何干扰。⁶⁸

在 20 世纪最初 10 年，政治刊物出现了，它也成为知识分子、学生和商人的

64 特鲁珀致海军署，1908 年 11 月 4 日，现存于 BA/MA, RM 3/6721, 220-223 对开页。

65 见李恩翰：《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Li Enhan, *The Mining-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period*) 台北 1963 年：364 页；赵振政 1986 年文章：90-95 页。

66 现存于 BArchB, Deutsche Botschaft China (德国驻华使馆), Nr. 1251, 150-152 对开页。翻印于罗梅君 / 余凯思 1997 年书：410-414 页。

67 这些团体同样在新的地方性集会中也非常活跃，并且要求从中央政府得到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尤其财政权。见汤普森，罗杰·R：《1898-1911 年宪政改革时期中国的地方自治会》(Thompson, Roger R.,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1898-1911*) 剑桥 1995 年。

68 见韦克曼，弗里德里希：《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1989 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Wakeman, Frederic, Jr.,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载利波塔尔，肯尼思等主编《现代中国透视—四周年纪念》(Lieberthal, Kenneth u. a. (Hrsg.),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纽约 1991 年，第 68-102 页。

广泛读物。⁶⁹此类出版物的出现意味着受过教育者越来越关注政治事务了。在大量报纸和杂志中，有关德国占领下的胶州的报道反复出现。这些报道几乎都对德国殖民地持严厉批评态度。与官方的观点相比，它们对殖民体系的想法大相径庭。在《北京官话报》1907年4月2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对胶澳租界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揭露了对中国人和欧洲人采用不同法律的做法，指出鞭笞被当作一种惩罚手段而施加于中国人，在法庭上，中国人要下跪而欧洲人却可以站着。⁷⁰另一篇文章是由一位在青岛生活过几年，名叫朱纪（音译）的记者写的，刊登于1909年的《北京日报》。文章的第一部分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人是如何遭受德国人的“强暴和虐待”的。他用呼吁团结的号召来结束文章：“然而山东人是我们的同胞；难道我们应当眼睁睁地看到他们如何受尽外国人的欺凌而不发出一声呼喊吗？——……中国民众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种族稍差。”⁷¹再引最后一个例子：一名记者对胶州作了如下描述：“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中国人与西方人被加以区别对待。他们（德国人）说，西方人文明，而中国人则属于不文明的野蛮人。颁布的法律因此同样不平等。它们根本不把中国人称作华人，中人或支那人，而是简单地叫做土人。”⁷²日益增多的对青岛中国民众所遭歧视的认识和对种族平等的要求，反映了一种新的政治修辞学和政治意识的形成。这与清政府官员所使用的词汇截然不同。后者强调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纽带和宗族关系，而在新政治话语中，中国人则被想象成了“民族”，他们要求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力。很明显，在这一观念中，民族内部的政治团结和政治凝聚力远远高于由松散的宗族和家庭构成的国家中的政治团结和政治凝聚力。一旦人民能够意识到民族平等并拥有政治自觉意识，建立在种族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有机社会就有可能出现。反过来，这也有助于中国人进行有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一话语与梁启超及其他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思想基本一致。⁷³对本种族和本民族的共同命运的关注居于这一新话语的中心位置，而这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尽管建立强大的国家仍是主要目标，但这一强大的国家应当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应当是与其动员“民族”的能力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者国家将从自下而上地创造出来。

有趣的是，在中国，对种族民族主义的发明和发展是与日益增长的视之为大

69 关于出版业和新闻业的兴起见维廷霍夫，娜塔莎：《中国新闻业的开始（1860-1911）》（Vittinghoff, Natascha, *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1911)*）维士巴登：哈拉索维茨2002年；米特勒，芭芭拉：《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中的权力、身份和变化，1872~1912年》（Mittler, Barbara,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剑桥、马萨诸塞2004年。

70 翻印于《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卷，济南1961年：126页。

71 见罗梅君主编，余凯思协助：《“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Leutner, Mechthild (Hrsg.)/Mühlhahn, Klaus (Bearb.),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柏林1997年：233—235页。

72 谢开勋：《二十二年来之胶州湾》（Xie Kaixun, *Ershi'er nian lai zhi Jiaozhouwan [The Jiaozhou-Bay in the last 22 Years]*）上海1920年：26-28页。

73 见菲茨杰拉德，约翰：《觉醒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斯坦福1996年：85页的杰出讨论。民族主义本是被用来唤醒中国人，让他们意识到殖民者的残忍的。

的全球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的认识相伴随的。正如利贝卡·卡尔 (Rebecca Karl) 在论述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 1895 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 尤其是在 1898 年改革失败后,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既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 也不仅仅是它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的结果。卡尔引用陈独秀的话说到: “中国不是唯一遭受凌辱的国家……波兰、埃及、犹太国、印度、缅甸、越南……它们也都遭遇到严重破坏并且变成了附属国。”⁷⁴的确, 被殖民化人民的命运已被看成是与黑人工人、印度工人等有相似遭遇之事了。这就使觉醒了的中国公众热切地意识到, 在一个充满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世界里, 中国的殖民问题也被许多处境危急的民族所分担。来自海外的中国人的报道对这些民族反对更强大的敌人的斗争表示了高度赞扬, 情绪高昂地把这些斗争说成是中国人的榜样。这些报道对民族主义话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以致于到 20 世纪初,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了把革命斗争视为建立新国家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在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兴起之际, 殖民主义的经历大大便利了将中国的斗争与世界周围地区的同类斗争联系起来。而且, 它显示了在中国民族主义之中所隐含的全球意识, 以及在融入全球结构和对边界进行话语划分这两者之间的固有的辩证法。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群体是青岛的劳工。他们普遍地缺乏商人所具有的强势地位。季节性劳工对殖民管理机构有很大的依赖性, 因而不得不迫使自己顺应殖民的社会秩序。在研究殖民社会时, 人们往往遵循下列原则, 即“哪里有强权, 哪里就有反抗”。⁷⁵然而, 与农业性的腹地不同, 胶澳租界的城市区域从未发生剧烈的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不过, 表面看来像是殖民政权的胜利的东西, 实际上经常隐含着反对外来统治的斗争元素。在被占领之后, 大部分中国精英群体都逃离了胶澳租界。留在租借地里的中国人共同体缺少其传统的社会领袖。⁷⁶新的群体试图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结拜的兄弟盟友和秘密会社开始取代儒家精英, 接管了对地方共同体的领导权。在德文报纸上, 这些社团的个别名字偶有提及, 如在理 (Zaili) 派、桃花源 (Taohuayuan) 派和南京帮 (Nanjing Bang) 等等。⁷⁷这些群体没有公开声明的政治意图。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后来这些群体中的一部分在地下王国里扩张开来, 从事着逃避关税、走私、鸦片贸易、卖淫以及与俄国人进行所谓的“苦力”贸易。尽管活动是非法的, 但德国

74 卡尔, 丽贝卡, E: 《登上世界舞台: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Karl, Rebecca E.,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达拉谟, NC: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95 页。

75 见余凯思: 《殖民空间与符号的力量: 分析文化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论思考, 以德国租借地胶州为例》(Mühlhahn, Klaus, *Kolonialer Raum und Symbolische Macht: Theoretische und methodische Überlegungen zur Analyse interkultureller Beziehungen*) 载罗梅君主编《政治、经济、文化: 德中关系研究》(Leutner, Mechthild (Hrsg.),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tudien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明斯特 1996 年, 第 461—490 页。

76 见西勒曼, 迪尔克·亚历山大: 《1897—1914 年胶澳租借地 (中国, 山东) 在德国管理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Seeleemann, Dirk Alexand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Kiaochow Leasehold (Shantung, China) under German Administration, 1897—1914*) 多伦多 1982 年。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66 页。

77 关于细节和引文见碧能艳: 《1897—1914 年德国在山东租借地青岛—因殖民化而引起的机构变化》(Biener, Annette S., *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Tsingtau in Schantung, 1897—1914.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durch Kolonialisierung*) 波恩 2001 年: 70—80 页。

当局倾向于忽略他们的存在，有时甚至与他们合作，只要他们不对德国的统治提出质疑。像在其他许多由外国人统治的地方的情形一样，胶澳租界也存在着一个势力强大的黑社会。⁷⁸殖民当局甚至不得不部分地用有组织的犯罪来充当其社会控制的工具。例如，在监督和管理娼妓业方面，卫生警察就与中国流氓携手合作。卫生警察因此可以确保妓院既接受中国嫖客也接受欧洲嫖客。⁷⁹胶澳租界的鸦片贸易和所谓的“苦力贸易”也或多或少的掺杂着犯罪因素和来自中德两国的一些社会边缘分子。⁸⁰因此，除了官方对秩序和卫生的强调外，还形成了一个中德混杂的世界，它并不使自己完全依附于合法的王国。下面要讲的一件事或许是对这样一种情况的典型写照。⁸¹区长在司法系统中的强有力地位也不得不向滥用和腐败让步了。1913年，克鲁森在胶澳法庭审理的一起案子暴露了一名在区公所工作达10年之久的中国文人懂得如何接受贿赂以作为对刑事犯作出有利判决的交换条件。1909—1913年在李村市郊农业区当区长的高斯(Grosse)很明显地与这位吸食鸦片的人文人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克鲁森在他的判决中并未讨论高斯是否也接受过贿赂。(高斯当时已离开了胶州)。

上文所讨论的大部分中国人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对德国殖民地持批判态度甚或极端仇视。但在20世纪头10年行将结束时，又有一些持不同的和友善的态度的人群出现了。他们尽管在原则上谴责外来的特权和统治，但对殖民体系中的某些因素仍颇感兴趣。例如，1909年在青岛成立了一所德中合办的高等学堂。这是当时唯一一所由外国人领导但也得到清政府资助和正式认可的教育机构。学生由中国政府来挑选。学校有一位由德国人担任的校长和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督察。上午，德国教师讲授西学；下午，中国教师讲授儒学作为补充。中国政治气候变动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学校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新的、个别部分甚至相当激进的政治观念越来越多的传入，晚清社会的许多社会精英开始把立宪君主制的德意志帝国看作为榜样和合作伙伴了，尤其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教育部门。1911年以后，若干清王朝的高级官员逃亡到德国租借地并在这置产购房，定居下来。⁸²在

78 上海地区黑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近来已在韦克曼1995年书，马丁1996年书中得到了揭示，见韦克曼，弗里德里希：《1927-1937年上海的警察治安》(Wakeman, Frederic,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伯克利1995年；马丁，布莱恩 G.：《上海青帮：政治与有组织的犯罪，1919-1937年》(Martin, Brian G.,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伯克利1996年。

79 见埃卡特，沃尔夫冈：《1897-1914年在中国的德国医生》(Eckart, Wolfgang, 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 Medizin als Kulturmission im Zweiten Deutschen Kaiserreich) 斯图加特1989年：31-33页。

80 “苦力”贸易是青岛的一项重要的且十分稳固的贸易。山东地区的农民被哄骗签订工作合同，随后被运到俄国修建跨西伯利亚铁路或在西伯利亚矿场工作。他们所受的待遇并不比奴隶好。当局作了很多“促进苦力出口”的努力，参见特鲁珀致德国使馆，1907年7月30日，现存于BArchB, Deutsche Botschaft China (德国驻华使馆)，Nr. 1244, 29-30对开页。

81 见高等法官克鲁森就高的犯罪行为所作的判决，1913年12月10日，现存于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联邦档案馆 /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 (帝国海军 / 帝国海军署卷宗，海军综合处) /6714, 116-137对开页。

82 1912年有12名清王朝的高级官员和一般的官员住在青岛，见梅耶尔-瓦尔戴克(Mayer-Waldeck)致海军署，1912年2月24日，现存于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联邦档案馆 /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 (帝国海军 / 帝国海军署卷宗，海军综合处) /6723, 84-85对开页。

此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将其子女送到胶州，并安排他们到德国学校中学习了。

国民党是另一股值得考虑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孙逸仙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他在 1912 年让位给袁世凯，自己则担任了铁道部部长。他也此身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游历和视察了中国许多地方。1912 年 9 月，令德国殖民当局深感惊讶的是，孙逸仙表示他将在 10 月份访问青岛。由于德国尚未从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德国当局对这一计划感到不知所措。他们给孙逸仙发了一份电报，指出孙的到访只能被当作一件私事来对待，不能期望受到任何官方接待。然而，孙逸仙仍热切地想到青岛看一看。青岛的 400 多名中国学生在获悉孙逸仙即将访青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大鲍岛的中国戏院举行欢迎仪式。校长凯普（Keiper）出面干预此事并称其为政治事件；根据校规，学生是不准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于是，所有的学生都提出了自动退学要求，并交回了他们的学生证。当孙逸仙最终于 10 月 2 号到达青岛时，紧张形势达到了顶点。但是孙逸仙劝告学生停止抗议，回到学校。他解释说，学生像军官和战士一样，必须服从国家指挥，不能享受新共和国所保证的自由。第二天，他参观了学校。在向学生发表的演说中，他称胶澳租界是“中国的一个模范居住区”⁸³。他继续说：“中国人在过去的 3000 年中也没有做到德国人在 15 年时间内就做到了的事”。他对此地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阅读了民政官员单维廉（Wilhelm Schrameier）写作的介绍胶澳租界土地制度的专著。1924 年，他邀请这位前殖民官员单维廉到广州为广东省制定土地政策。因此，胶澳租界所得到的最积极评价恰恰来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在访青后发表的访谈中，他根本没有提中国人在胶澳租界所受的歧视和虐待。他也未提及权利或主权的丧失。很明显，他是被德国海军所实施的有组织的官僚政治资本主义吸引住了，在他担任铁道部长的这个时候，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体制不同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德国实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使国家在控制、监督和指导社会 and 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理应为其利益对经济和社会加以干预。居于首要地位的不是私人的利益，而只能是国家的利益。

结论

青岛的殖民世界是复杂和异质的。拥有自己的利益并努力争取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社会群体在殖民空间里相互竞争。德国的殖民统治从未导致中国人的团结，甚至也未使德国人形成一个整体。这确实是民族主义编年史的一个神话。相反，殖民政权机构推行的排他性控制在所有方面都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碎化。推行不同策略以应对殖民主义的不同群体由此而生。每一种策略都与中国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观念交织在一起。殖民地由此成为了一个颇具活力的社会领域，其中充满了产生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矛盾，而这些处于外来统治之下的不同群体都不得不为保护或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斗争。必须注意的是，重塑殖民社会的殖民规划的实践结果有悖于其初衷。政府是外来的和不公正的，并且殖民统治并未存在于一个密封的独立王国之中，通过被殖民者的参与，它受到了重新评价和改变。在把殖民社会重现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秩序方面，

83 梅耶尔-瓦尔戴克致海军署，1912 年 10 月 14 日，现存于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联邦档案馆 / 弗莱堡军事档案馆），Reichsmarine/Reichsmarineamt（帝国海军 / 帝国海军署卷宗，海军综合处）/6723, 316—322 对开页。

殖民宣传无疑获得了成功。部分中国的和德国的精英被吸引到了殖民的自我重现之中，而这一重现在中国和德国的主要群体中也成功地赢得了支持。不过，实际情况与之完全不同。腐败和对地下势力的依赖、卖淫和有组织的犯罪都揭示了中德混杂世界的较黑暗一面。

在这里，占有突出地位的是中国人应对殖民主义的多样性。类似的复杂性已在有关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研究中得以展现出来。⁸⁴在这个变动不居和被搞得支离破碎的殖民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规划逐渐显露头角并且得到了商谈。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复杂多样的民族传统和长时段发展轨迹的中心地位。不过，除了这些已由民族主义编年史置于突出地位的、长期存在的传统外，自帝国主义出现以来所形成的全球性互动也给这一内部历史添加了一个外部因素。民族争论与大趋势和总过程实现其共时性连接的做法容许社会行为人与全球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些背景并未创造民族主义，但它们确实影响了，甚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借以想象民族和实践其内聚与排外机制的方式。

然而，在一个流动的 global 环境中，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似乎被有机地联结在了一起。民族意识至少部分地是在应对殖民遭遇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国人共同体在外来支配下的存在催生了有关民族内聚力和民族构成问题的产生，并使之流入到民族主义话语之中。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在殖民的或半殖民的背景下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改变并获得了锐利的棱角和清晰的轮廓。

这里有争论的便是对一些有关民族主义历史的共同假设的修订。尽管对某一民族“本质”的长期延续和长期存在的相信早已被解构了，但是新近出现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大多数理论仍特别关注现代“想象的共同体”的时间维度。尽管人们已经确认大多数民族系谱确实是在回溯中构建的，分析的焦点仍集中在民族疆域内部被严格概念化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结上。然而，青岛的例子已经显示出，在殖民背景下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的呈现出特殊形式，不仅仅源于传统，至少也部分地是殖民背景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纠缠的结果。因此，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改变和变化，不仅是一正如我们为熟知的一些画面所提示的那样一内部的、历时的现代化的结果，而且也同样是多重共时进程的结果。

(孙立新、朱光涌译)

作者简介：

[德] 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美国伯明顿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

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朱光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84 近来关于香港或者天津的一系列作品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解读。见例如纳柯 1999 年书，罗杰斯基 2004 年书。